

文学批评家丛书

探寻者的心踪

何西来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探寻者的心踪

何西来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钱钟书

封面设计：姚正选

版式设计：徐秦生

责任编辑：李贵仁

文学批评家丛书

探寻者的心踪

何西来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2插页 393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统一书号：10094·694 定价：3.65元

序

朱 寨

我以为何西来同志用《探寻者的心踪》给自己的这个集子命名是很恰当的，可以说有双关的意思：因为这个集子的多数文章是对于当前作品的评论，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新时期的生活内容和问题，进行了各自的寻求和探索，因此，都可以称为“探寻者的心踪”；收在集子里的关于这些作品的评论，以及其余几篇理论性的文章，都是对于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和理论的探索，也记录了作者本人探寻的心踪。

何西来同志属于我们所谓的“中年”一代。“中年”这个概念在我们国家，在我们时代，有着复杂的内涵，对于他们来说，主要意味着沧桑辛酸和重任在肩。他们不管是否受过“错划”、“审查”的政治苛待，谁都没有躲过十载历史浩劫的风吹浪打。那时，他们正当青春年少，血气方刚，无不自以为是弄潮者，而在中流漩涡洄游浮沉。现在，他们虽韶光流

逝，但也较早成熟。因为他们曾与自己的国家、人民风雨同舟，亲历灭顶之险，也就更加深切地体味到了历史的教训，意识到了自己的时代责任。中年作家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坚，他们的创作喷发洋溢着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这并非偶然；而作为一个中年评论工作者，能敏锐地感应这种心迹脉搏的跳动，也不是偶然。

其实何西来同志并不是搞当代文学评论专业的。他的研究专业是文艺理论。他原来的学识根底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在大学期间，他就发表过关于杜甫研究的长文。如果他在这方面发挥他的专长，肯定会超过他在当代文学作品评论方面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中年人，时代的责任感，胜过个人的爱好；明知自己的所长，他人潜心专业的学术成就也令人眼羡，但都未能动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同代“探索者”“心踪”的探寻。

也许由于这样的缘故吧，这些评论作品的文章，不是隔岸观火。对于评论的对象，不是漠然无情地做出严苛的理性的裁判，而仿佛是与自己的战友促膝交心，从中感到一股感情的热流，心心相印的理解，同感共鸣的赞助，齐备共勉的鼓舞。即使严格的批评意见，也使人觉得是出于诚恳的建议和提醒。其中《一个执著得近于固执的诗人》很能代表评论者与自己对象的这种至情。就是其中的理论文章，笔下也常带感情。

我们经常听到对文学评论缺乏艺术分析的指责和加强艺术分析的呼吁。从批评成为批判以后，文学评论就戴上了一副审判者的铁面具；政治标准成为衡量作品的唯一要求，艺术分析自然甘居末位。近年来的文学评论的面貌确实大有改观。不过，有的文章也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多用几个“美学

的”、“审美的”、“美感的”等概念空洞的名词，就算艺术分析？这使我们想到鲁迅先生的评论。

鲁迅先生的评论文章中并没有“美学”之类的字眼。他警告文学青年不要受文章作法之类写作秘诀的欺骗，但他对作品的评论确实做到了真正的艺术分析，既不是生硬的政治裁判，也不是枝节皮毛的褒贬。他为一些作品写的序言，篇篇都是精湛的艺术分析。特别是《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可以说为我们树立了文学评论的典范。对于作品既能体察入微，又能概括全貌。例如关于废名创作的特点“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概括得多么生动准确。对于当时一种创作倾向的批评，“咀嚼着个人身边的小小悲欢”，至今脍炙人口。不久前一篇评论文章未加引号和注释援引了这句话，成为警句重新流传。评论文章中那种对作者的体贴爱护之情，令人倍感亲切。

茅盾先生给《呼兰河传》写的序，也是作品评论的典范。序言写道：“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采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而作品的“美”又“有点病态”。同时指出作品的艺术特点与作者的思想局限血肉相联，这是由于作者“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的缘故。这是“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而“见之于全书的情调”。真可谓思想与艺术分析概括的统一，也是知人之论。对于《呼兰河传》的精当评价，至今还没有人超越。

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悟出：作品评论除了理性的逻辑思维，还需要有对形象的欣赏和感应。欣赏和感应的第一步就是对作品化入的体察，对作品的评价既需要逻辑的推理归纳，同时也需要形象的描述和综合、分析。即使不曾读过作品，从艺术的

概括中也可以获得作品的完整印象，从艺术的分析中可以感受到作品的血肉生命。因此这样的评论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评论也是艺术创作，即艺术地再现作品对象的创作。因此评论者除了有冷静的头脑，还需要有强烈的感情，与创作者相应的通感共鸣的感情。因此我认为本集中的作品评论，首先在感情上对作品入化体察，从中感受到了作者的“责任感和勇气”，捕捉到了作者“心灵的搏动与倾吐”。

西来同志的文章有己见，有激情，但并不使人觉得主观武断，强加于人。开诚坦率，切磋容让的态度，更表现在他平素的为人上。他曾与不少人合作写过文章，都合作得融洽始终。合作中不是没有分歧争论，但从未因为与自己观点意见的分歧而影响关系和友谊，更不用说分崩离析，结冤记仇。在他周围经常聚集着一些同志，或坐或立，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争论中他对人心平气和，疑义相与析，即使碰到伤人恶语，也不介意，不存芥蒂。一次在他家，我毫不忌惮地侃直地批评了一篇作品，他始终静静地听着。但他爱人却忍不住掩口笑起来。原来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恰好与我的意见相反，我那些有点不敬的话其实是落在他的身上。他站起来豁然地解释说：“这有什么关系？有不同的意见好嘛！”听说他有不同的意见，反使我更加无顾忌地发挥开来。

他的这种治学为人的态度，以及与同志们的这种关系，是已故所长何其芳同志的遗风。何其芳同志在学术观点上是很有主见甚至是固执己见的。但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又很民主。他的某一学术观点形成之前，都要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他的每篇论文发表前，都要先打印出来广泛征求意见。对每一可取的意见，包括标点符号的订正，他都虚心接受采纳。从来没有

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对一个同志的感情，更没有因为学术上的分歧而挟私报复。人民内部的学术争鸣，正应该如此。这样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深入。很难设想，在双方以“先生”、“老顽固”相讥讽的气氛下，学术讨论会是友好正常的，会不把分歧变成仇隙，会不把自己的意见引入歧途极端。因此，我以为本集文章的探讨态度，也是可取的。

自序

我崇尚为人生的艺术，不相信文学会高雅到蜕尽人间烟火。我欣赏艺术境界的灵空、飞动，赞叹技巧运用的精熟、圆练、举重若轻。它们都给我以美的享受，让我惊服于人的创造才能。但是，这并不是文学功能的全部。我不认为文学的目的仅仅在于自身，仅仅为了自身。真正伟大的艺术，总要肩负自己时代的使命。艺术家是人生征途上的执火者，他们的作品，是用生命点燃的炬火，是灵智的明灯，是精神的太阳，照亮着世代跋涉者的脚步，给他们以启迪，以慰藉，以希望和力量。

因此，文学固然探索着艺术、形式、技巧，追求着美，但它首先追求着更圆满、更自由、更合理的人生；它是进击者手中的利器，不是摆设，不是装潢，不是有闲者消遣的玩物。创作是对人生的探求，是探求者心灵的记录；鉴赏也是对人生的探求，但却要通过作品的中介。评论，包含了评论家的鉴赏体验，但却不仅仅是鉴赏。它主要是一种理论活动。评论家当然思考艺术，思考美，但更重要的是思

考人生。评论文章，不仅仅是评论家在作品中心灵探险的记录，是他与作家心灵相撞时迸出的火花，同时也包蕴了他探索和思索人生的果实。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学评论就是指出一个作品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好象普希金就有过类似的看法。这当然是并不错的。但是评论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如果评论家只是跟在作家的后面评头品足，那么评论就没有独立的品格，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品传达着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和评价，评论则通过对作品的剖析，传达着评论家对人生的理解和评价。因此，评论家如果想用某种固定的模式，框住作家的形态各异的创作追求，固然不可取，但也决不可把评论仅仅变成创作的附属品，派生物。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把创作和评论看作两种完全互不相干的东西，我想强调的只是，评论家只有具备独立的人生见解和艺术见解，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评论。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有作家的作品在，人家为什么还要读你的评论？而且，在我看来，评论只有多少具备超出或高出作家的某些见解，才会对作家的创造，对读者的鉴赏有所帮助。这里的高出或超出，不是说评论家一定要比作家高明，否则就不许动笔，而只是说当你动笔的时候，一定要先想想，你的见解仅仅是重复作家给定的东西呢，还是在他止步的地方，有所发挥，有所补充，有所前进？

作家和评论家，面对着同样的人生。但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完全重合。这就有了可以补充与发挥的余地。评论家如果将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得来的独特结论，注入评论文章中去，笔下就会有新颖感，有光彩。许多平庸的文章，之所以让人感到乏味、沉闷、难以卒读，其原因就在于

缺乏新颖的见解和独特的思想。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难难在提炼自己的人生体验，使之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判断；二难难在把这一个一个的认识和判断，在平素有意识地积累起来，象穿珍珠一样串成一个知识链，随时可供调用；三难难在评论作品时，能够通过自己的艺术敏感，找到契合点或衔接点，把自己的人生见解传达出来。它们或作为参照，或作为对比，或顺向发挥，或逆向补充，都应让人感到自然而然，不是外加的，硬贴上去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把评论看作自己对人生的探求，看作一个没有止境的认识过程和攀登过程。而艺术的探求又是与人生的探求相统一的。回首秉笔之初，齿在弱冠；于今已年近大衍。屈指算来，四分之一个世纪早过去了，并没有写出可堪传世的好评论来。因此，每逢刊物约写谈评论的文章，总觉得汗颜，心下有愧。但也总还是写了。不是真有多少经验可以贡献给后来者，而是借此聊以鞭策自己，朝着尚未达到的目标奋斗。

我写评论，是从古典文学起步的。那是一九五八年，我正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同年，提前毕业留校。那时，各高校正在批“白专”，拔“白旗”，我的一些同学，成了“批”和“拔”的对象；我的老师傅庚生教授，更是重点的重点。傅先生学有专长，是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艺术鉴赏素养极高。很有影响的《文学欣赏举隅》就是他写的，俞平伯先生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傅先生都是首当其冲。又因为他影响大，所以每次运动后落实政策，也总是第一个想到他。傅先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学术批判运动”中被加上“宣扬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罪名，他的《杜甫诗论》也就变成主

要的反面教材。学生们从中摘出了许多“唯心主义”的段落，口诛笔伐，其实都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但傅先生态度始终很好，大小批判会上，仔细地听，还做笔记。我没有听到过他公开的抗争，他也从不为自己洗刷或辩护。面对着他的学生对他的批判，他能说些什么呢？如实地指出他们的幼稚、可笑、荒谬吗？他说不出口，大约也不忍心那样。即便处于那样的逆境，在发了疯的后学面前，他仍保持着一位宽厚的长者的风度。

那时，我血气方刚，正不知天何其高，地何其厚之时也。在批判傅先生的行列里，也有我，而且冲在前面；会上发言，辞锋犀利，有哗众取宠之心。现在想来，我的每一句话，都象利刃一样，深深刺进了我的老师的心房，他的心一定在流血。记得在一次会上，傅先生听完我的批判发言以后说：“听了何文轩同学的发言，我的感觉是英气有余，而沉郁不足。但如果我们现在从同一个起跑线上比赛，他将来一定会比我跑得更远些。我老了，比不过他。”我知道他的话里所包含的复杂感情，其中颇多感慨，似乎什么味儿都有。讲这样的话，与那个场合很不相宜。“英气有余，而沉郁不足”，是傅先生对我的很委婉的批评。是他，教我懂得了欣赏，有了初步的古典文学知识，刚刚靠着仇兆鳌的详注可以大致读懂杜甫的诗。但是连他写的《杜甫诗论》还不一定完全弄明白的时候，就煞有介事地“批判”他了。而他并没有错。至今，我并没有如我的老师所预期的那样，青出于蓝，比他跑得更远些，但“英气有余，而沉郁不足”的毛病，也还是如影随形，不见长进。然而，自那以后，在我几十年来的人生之途上，无论做学问，做人，我总是常记着他对我批评中的期望，和期望中的批评。

不知道后续者的前行，是否一定要以对自己前辈的伤害为代价，但我的评论生涯的起步，却确实第一脚就踩伤了我的老师。傅先生已在前两年故世了，想起他，我常感愧疚。他泉下有知，大约不会认为我比别人更坏些，虽然我曾使用过那样锋利的语言刺伤过他。我想，他会认为那是由于我的无知，而不是生性残忍。

那年，“学术批判”的狂涛终于平息下来，我也作为助教调下一年级辅导，参加《杜诗研究》小组，按系领导的要求，集体编写一个与傅先生不同的用“新观点”评价杜甫的研究著作。那正是一个吹牛吹得昏了头的年代。两个本身知识准备就不足的助教，带着一帮知识准备更不足的学生，发誓要完成一部空前的“专著”了，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和当时“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一村出十个李白、郭沫若”的浮夸一样，稿纸浪费了一大堆，熬了不知道多少通宵，书却不曾写成。后来，由我执笔的稿子，留下两章。经过修改，一章发表在次年的西北大学学报上，它应该算是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论文。篇幅倒是不短，却幼稚得很。另一章是我作研究生的时候，经辅导写作的蒋和森先生推荐，发表在一九六〇年的《文学遗产》上。

虽然研究杜甫是我的老师傅庚生先生以他被批判的苦难方式，心滴着血，带我上了路，这是荒谬环境下的荒谬现象，但是研究的对象杜甫，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杜甫崇真尚实的人生理想和美学理想，他仁心广被，爱及众生，爱及鸡、雀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患意识，他对妻儿，对故人的诚笃、深挚的道德情怀，都曾经给我刻骨铭心的人生的启示，并渗透于我的批评观念之中。

我的第一篇当代文学评论写成于一九六一年，发表于次年的《延河》二月号上，叫《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这篇习作，是从史诗效果探求的角度谈《创业史》的艺术结构的，而且从作品独特的艺术构思出发，着重分析了素芳的命运。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亲是农民，熟悉解放前后农村的生活和贫苦农民的苦难，也熟悉柳青笔下土改之后到合作化初期的农村。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中提供给我的，并不是如读域外小说那样的陌生世界，而是我非常熟悉的环境和人物。它们激活了我的生活积累，仿佛我也参与了创造，在其中生活和思考。我对素芳命运的分析，以及对人物性格发展的预测，其初始动机是不同意姚文元在一篇评论中对这个人物的责难。他认为作者把她写成了生物的人。但是我却对苦命的素芳充满了同情，相信柳青也同样对她充满了同情。在素芳的遭遇里，我看到许多我所熟悉的农村妇女的共同命运。她们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她们一样有争取爱情、幸福、解放的权利，一样有争取做人的权利。我从素芳身上，看到的不是什么“生物性”，而是柳青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人道主义的思考。预测她的未来的命运，如其说是出于对人物性格逻辑和她生存的历史环境的把握，不如说是出于我的一种热烈的愿望。就是说，我认为她应该那样。

这篇评论发表后，柳青很重视。前几年听他女儿讲，直到去世前不久，柳青还向人推荐它，以为比较接近他的创作意图。读《创业史》的时候，我确实仔细揣摩和猜度过作家每一个描写后面的用意，使自己在鉴赏中的再创造尽可能符合于柳青思维推进的内在逻辑。但是，当我进行理性的把握，作出某种判断的时候，却把我自己的人生探求，把自己在这探求中长期积累

起来的思考，作为主要的思想参照系和生活参照系放了进去。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篇文章，不难发现初学写作者的幼稚，但这幼稚也是我独有的，我自己的。它们表现着这篇文章中我的全部思考的另一个方面。我在文章中不仅仅重复柳青的人生见解，虽然他的某些见解曾让我震惊得颤抖，象电火一样照亮了我的思路和视野。我更重视我自己的人生见解和艺术体验，只有它们才真正能够用来诠释、发挥、说明作家的见解，与之衔接，产生共振，成为我的评论的灵魂、骨骼和血肉。我深信，评论的价值，决不是被评论的作品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属于作家，不属于评论家。评论的价值只能是评论家的见识的价值。

就在《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发表的那一年，我在假期从北京回陕西探亲，到西安时去看望柳青。正赶上他从长安县的生活根据地皇甫村进城，和他的夫人住在人民大厦。见到他时是夜里，我们谈得很晚。他说看了我的文章很高兴，很赞成我对素芳形象的分析，对题叙的评价和对第二部某些人物发展的预测。柳青是前辈，虽然他态度平易、亲切、和婉，但我还是显得拘谨。不过他热情的鼓励，仍然让我感到一种被理解的愉快和兴奋。他的夫人微笑着坐在旁边，听我们一老一少促膝交谈，并不插话。送我到大门口时，夜已深了，满天星斗，有些凉意。临分手时柳青告诫我，切不可把今晚他与我的谈话，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拿了到处去吹嘘。实在说，听了这话，我心里曾掠过一丝不快：我还不至于那么浅薄。然而，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关心的，爱护的，我感到了温热。自那次握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柳青。但我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绑到长安市上游街示众；他在皇甫村生活和写作的家，

被夷为平地；他的夫人也跳井自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勤奋写作，但毕竟已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奄奄一息，没有多久，便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柳青曾说过，“文学是愚人的职业。”我想，创作如此，评论也如此。它们都需要献身的精神。柳青本人就是以极严肃，极刻苦的精神，献身于文学事业，从事自己的创作的。我虽然只写了一篇对柳青的评论，却从他身上得到了不少认真对待人生和艺术的启示。

做研究生毕业以后，我被调到文学研究所。先是劳动锻炼，参加“四清”，接着，一个跟斗翻到“文化大革命”的狂澜中去，随波上下。正如当时很多狂热的年轻人一样，我做了很多蠢事，也经历了一番世态炎凉，人情悲欢。前后整整十三、四年，不曾提笔作文，好象和文学研究脱了钩。而在“连窝端”下“五·七”干校的几年，文学研究所改名“第五连”，连学术单位的牌子都取消了，更何况读书和写作。

“文化大革命”是愚昧和昏暗的年代，但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却并非绝对的空白。我从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灾难中，慢慢醒悟到应当用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头脑思考问题。经过艰难的精神蜕变，我终于从狂热走上清醒，根据切身的体验，深化了对人生的理解。这种理解，有血肉，有实感，不是纸上得来的东西，不是空泛的概念。它们是我考察新时期文学创作时的内在支撑点，并且通过我所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体现出来。

我所说的精神蜕变，是指自己的思想从僵化的，“左”倾的，教条的硬壳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漫长过程，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它开始于“文革”后期，粉碎

“四人帮”之后，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加快了。我追踪着新时期文学的大潮，注视着它的流向，倾听着它的脉动，并且把这一切记录在我的评论文章里。把这些文章排在一起，大致可以看出我近十年来精神蜕变的轨迹。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是主潮。它的基本特点是贴近现实人生。它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些明显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则呈现出多方位、多角度、多流向的态势。“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第一次真实地揭示了十年浩劫及其以前一段时间内“左”倾思潮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灾难，揭示了这灾难对人的心灵的戕害，描写了各种人物的命运和悲剧。这一切，长期以来是文学不曾涉足的“禁区”。不是作家不愿写，而是写了就不允许，就会招祸。于是，只好绕开这些实际存在的阴暗面，只好在人民群众日见深重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到处都充斥着粉饰升平的文学，造神和颂神的文学，图解“左”倾政治观念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是远离现实人生的，是艺术的末路。因此，当新时期文学以久蓄的力量，艰难地，然而顽强地，不可逆转地恢复它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时候，我用全部的热情欢迎了它。我从中看到的不只是艺术的复苏，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清明理性和现实精神的复苏。我看到了振兴的希望。因此，我的评论文章几乎是毫无顾忌地为这种新起的文学潮流一路辩护过去。我认为，这不是为哪一部作品、哪一个作家辩护，而是为了一个正在展开着的伟大历史时代辩护。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评论家应尽的责任。

我不想隐瞒自己在个人鉴赏趣味上对现实主义的偏爱，虽